

鴻程集

杜平



主編 斯 簡
HONG CHENG JI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7.1

4

鴻程集 杜平

主編 斯 簡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鸿程集

斯 筠 主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23 印张：5 字数：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05,000

ISBN 7-212-00294-1/K·48 定价：2.25元

目 录

洲际红色电波 长空万里幸会	廖 辉	(1)
水西村史话	唐 棣	(7)
跟随少奇同志在敌后	周志慎	(13)
先遣出江南	廖肇权	(22)
皖南突围记	曹丹辉	(27)
难忘的粟司令	沈大卫	(36)
苏浙军区交通线	吴明义	(39)
追忆李景瑞	徐义宁	(49)
狱中斗争	陆延年	(56)
回顾解放军通信兵的成长壮大	李景瑞	(65)
浅谈新四军的通信建设	季 凌 斯 简	(72)
新四军建军初期的有线电通信	黄宛年	(82)
秘密电台随“汤团”行动	徐炳全	(85)
抗大生活回忆片断	李玉堂	(89)
寻父记	竺明程	(95)
南下苏浙纪实	季 凌	(99)
马背上的电台生活片断	朱守根 朱忠益	(104)
红装信使	朱 云	(109)
青东记事	吴鹤鸣	(115)
浙东游击纵队电训班	姜峻海	(121)
浙东无线电侦察记	谢恒甫	(127)

一百打干电池	艾 平	(131)
船上电台	易 明	(134)
诗词十首	贺占魁	(137)
诗词四首	孙敬涵	(147)
诗一首	张荣才	(150)
诗一首	王益三	(151)
诗一首	余金允	(152)
诗一首	王元石	(153)
诗一首	麦 浪	(154)
词二首	戴 彬	(155)
编后话		(157)

洲际红色电波 长空万里幸会

廖 辉

红军长征时，我在红二十五军工作，先是给吴焕先政委当警卫员，以后调到保卫局任保卫队副队长。1935年9月16日，红二十五军先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，同陕甘红军（陕甘边和陕北红军）胜利会师。9月18日，两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。这时，敌人正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“围剿”，红十五军团为了粉碎敌人“围剿”，迎接党中央、毛主席到陕北，以围城打援的手段，先后在延安以南甘泉劳山地区和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。歼敌一一〇师人部和一〇七师4个营，缴获敌人一批武器、装备。还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，俘敌电台报务员、机务员。战后，这部电台，送到了军团保卫局。我有幸平生第一次见到无线电台。说来也巧，正是这部电台，沟通了党中央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。

1935年10月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，11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。会师后，党中央决定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，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序列。我们军团保卫局也并到方面军保卫局。11月下旬，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，这一胜利，成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区，庄严的奠基礼。整个革命形势在

飞跃发展，迫切需要扩大通信队伍。军委三局王诤局长派员在机关、部队挑选年纪轻，政治思想正派，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学习报务、机务，加速培养通信技术干部。那时，我刚满18岁，荣幸地被挑选上。12月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移驻瓦窑堡，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。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，通过了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》，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，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。会议还通过了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》，确定了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加速扩大红军，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指导思想。为了实现政治局会议的决议，军委三局根据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指示，组建一批电台分队，以满足各方面对电讯联络的需要。我被派到新组建的十一分队，主要任务是联络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。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电台，在当时的电台中，功率较大，大约是100瓦。经王诤局长亲自组织人员检查整修，就分配给我们分队使用。那时电台人员很缺，分队只有3人。队长赵玉珍是老共产党员，曾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，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。分队还有一个机务员，姓尹，是劳山战役中解放过来的，他的机务技术较好，对这套机器也比较熟悉。我当时还不能独立工作，但是，我做过好长时间的保卫工作，具有这方面的经验。王诤局长对我们3人，分别进行个别谈话，他强调联络共产国际电台的重要意义。他说：“联络共产国际电台，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性任务，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。在此之前，共产国际曾多次向我们输送电台，以期沟通联络。就在赵玉珍同志归国前，苏联就曾派人携带一部电台，用骆驼载着入境，在途中被敌截获。

现在各路红军已经胜利会师，党中央就设在陕北，完全有可能沟通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。这个任务由你们来担任，非常重要，也很光荣。希望你们克服困难，完成任务，不要辜负党中央的期望。”……他还向我特别交了两项任务：第一，向尹机务员学习机务，把整个装备技术学到手，尽快独立工作；第二，注意保护好电台，防止破坏，这两项任务，对我来说，难度是很大的。但是，正如朱总司令说的：“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‘困难’两个字的。”我向王净局长保证，决不辜负党的信任。

莫斯科位于欧洲大陆。在超远距离上，要沟通电台联络，决不是轻而易举的。赵队长想了许多办法。为了增强电台发射效果，他把电台位置选在瓦窑堡西北侧的一个山顶上。白天，他率领我们上山勘察地形，确定天线架设方法。傍晚，三局派来了监护排、运输排的同志，和我们一起把机器设备、炕桌、天线及必要的联络用具等搬到山上。赵队长具体交代了架设任务，我们很快把电台架起来了。接着，由赵队长亲自试机，对收报机、发报机、发电机马达及其他配件，逐一检查试验，确认正常完好，一切就绪后，只待联络时间的到来。

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联络，由于高空电离层的影响，白天难以沟通，双方约定联络时间为莫斯科时间下午18点正，中国时间子夜24点开始。时钟刚指到23点半，赵队长急切地提前打开收报机。转动旋钮，全神贯注地开始收听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刚过24点，赵队长突然兴奋地大声说：

“出来了！对方呼叫了！”莫斯科电台正按约定的联络文件、联络时间开始呼叫我台。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长久失

去的电讯联系，即将在今夜恢复。

当对方呼叫完毕后，赵队长立即打开早已调谐好的发报机，按动电键，回答对方。满以为几天来的辛勤准备，今日可一朝沟通。但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对方未听到我方回叫。如此双方反复呼叫、回答，一直延续到凌晨3时许，终未能沟通。末了，对方就停止了呼叫，我们只得连夜把机器、设备全部搬回山下。首次联络不能沟通，在电台工作中是常有的事，这并未使我们灰心丧气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个傍晚。第二日、第三日，我们早早地把机器架在山上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严格恪守约定，准时在子夜呼叫我台，但都未能沟通。赵队长带领我们把整个发信系统，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再次反复校准发信波长(频率)，调整发信机最佳输出。改架天线，提高天线的方向性；用指北针测定莫斯科的具体方位，把天线最强发射方向，对准莫斯科。经过一天的紧张忙碌，于第四日夜里1点多钟，亚欧大陆的两支红色电波沟通了。

双方沟通以后，对方开始发报，赵队长全神贯注地抄收，几经重复校对，一份100多组的电报抄收完全。这份电报每组以五码组成，显然，这是苏联密码的电报的组成方式。赵队长迅速给对方以电报收据。我们台与共产国际电台的第一次联络结束了。电报立即送到中央机要局翻译……

次日上午，分队经历了几个夜晚的焦虑，紧张以及成功的喜悦，我们正在美美地休息，三局王净局长派人来通知：小超同志(邓颖超同志)要见我们，让赵队长和我，立即赶到她的住处去。

邓颖超同志和周副主席居住瓦窑堡西山坡一排三孔的窑

洞里，我们向警卫战士问清了首长所住窑洞，便跨进门去。见到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。室内整洁、简朴，除了几只文件箱以外，没有值钱的东西了。我跟在赵队长身后往里走去。邓颖超见我们进门来，立刻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：“是十一分队的赵玉珍同志吧？快来，请坐……”因为我们俩是邓颖超同志约见的，周副主席继续办公。赵玉珍详细地汇报了联络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的情况。邓颖超同志听得非常仔细，还询问了不少联络细节。末了，她满意地说：你们能和莫斯科电台沟通联络，很不容易呀。我们党中央能经常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，有很大意义。可以通过共产国际及时了解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，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，还可以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等国家的政治与道义的支持和帮助，我党的政治主张，也可以通过他们向世界传播。……现在，已经由你们沟通，一定要切实保持好联络，不能中断。同时，要十分注意保密，决不要泄露我们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。在内部，也只能说是联络自己部队的电台……这时，周副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走下炕来，亲切地转向我们说：

“你们和共产国际联络通了，很好嘛？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多年的空中联系，让你们给恢复了，很有意义。希望你们继续努力，千万不要中断。”邓颖超同志接着问：“你们和共产国际联络中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困难？可以提出来。”于是，赵玉珍同志把进一步搞好联络的想法和打算，又作了汇报，并提出：“想找一个合适的高地，能有窑洞，工作起来方便，电台机器就不必每天搬上搬下，就可以与对方商量增加联络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。”邓颖超听了，非常赞同。她说：“我支持你们，你们可以到周围去找地方，选

准以后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们腾出地方来，电台就可以搬过去了。”

事后，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，我们分队电台的工作地点，一直非常理想。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转移至保安，又从保安进驻延安。我们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，一直非常顺畅。

这次邓颖超和周副主席的接见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首长们亲切和蔼，平易近人。他们关心我们的通信事业，热忱关怀每一个机关部属的工作，只要有一点成绩，便在百忙中亲自接见，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，首长们亲切的教诲，使我浑身平添了无限力量，对做好通信工作更加信心百倍。正是这种领袖与群众，领导与部属的手足情谊，正是这种共同的远大理想和政治上的高度一致，鼓舞着千万革命战士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。

水西村史话

唐 棣

水西村是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所在地，这段历史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。

水西村是江苏省溧阳县境内的一个小村，位于县城以西18公里。当汽车到达溧阳县的旧县车站，折向西北，驶上一条权路，爬过一道土坎，水西村便豁然在目。这宁静的小村曾是藏龙卧虎之地。50年前，两位功勋卓著的当代名将陈毅、粟裕曾经住在这里，导演了江南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剧，使水西村载入革命史册。

那时的水西村不足百户人家，地理偏僻，天灾人祸，是苏南少有的穷乡僻壤，村东南横着两条20多米宽的河，村西是河沟交错的水网地，村北临近茅山。这一带，30年代初就有我党的活动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溧阳县农村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，并开始酝酿武装斗争。陈毅同志选定水西村为其指挥中心，是颇具战略胆识的抉择。

进水西村，迎面有一幢高大的古建筑，座西朝东，大门宽阔，延接着波形的院墙，十分醒目，这里便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旧址。这座古建筑原本是李姓家族的宗祠，题名“光裕堂”，1938年11月，陈毅同志住进这里，1939年11月7日，又在此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，粟裕同志也曾住在这里。

为此，这座“光裕堂”就和他们的名字紧密相连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，这里便成了造反派的“演武堂”，惨遭破坏，后来又遭受一次强烈地震，整座建筑便荡然无存。1984年，党和政府决定重建“光裕堂”，辟为陈列馆，以恢复当年的历史风貌，纪念先烈，教育后人。

陈列馆面积约1500平方米。大门上方挂着粟裕生前所书的“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”金字横匾。跨进大门，穿过天井，便是前厅，前厅大门上方是叶飞同志写的横匾“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陈列馆”。前厅中央，并肩立着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的全身铜像，生动地再现了两位将军当年驰骋沙场、并肩战斗的英姿。厅的后壁悬挂着紫红天幕，上有李一氓同志题词“威镇江南，功在民族”8个金色大字。

陈列内容分为《新四军东进》、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水西》、《坚持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》、《碧血洒江南，光辉照千秋》等四部分，外加《序报》和《结束语》。陈列馆的后厅两厢各有一室，右室是当年陈毅的住处，现按原状布置。据老同志们回忆：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，陈毅同志大部分时间在这里住宿和办公，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。1940年春末，他与张茜同志在这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，墙上挂着一幅他俩在水西村外散步时的合影。后大厅的左室有阁楼，当年是粟裕同志的住处。室内陈设仅一桌一床，床上叠着黄军毯，墙上说明书写道：“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，粟裕同志在此住宿和办公。”卧室前面的天井左侧，现在埋有他的骨灰，墓碑上是溧阳县人民政府篆刻的碑文：“1984年4月25日粟裕同志部分骨灰敬撒于此”。

陈列馆展出的史实，是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，

是用鲜血写下的悲壮史绩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的政策，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，大片国土被敌占领，人民受尽烧杀奸掠之苦。当此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中国共产党命令刚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，立即向江南挺进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。“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，东进，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。”1938年4月，粟裕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先入苏南进行战略侦察；5月，陈毅、张鼎丞同志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一、二支队挺进江南，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，使整个华中抗战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。

茅山，乃是道教胜地，林木茂盛，群山叠翠，地势险要，山区方圆近百里，跨苏、浙、皖三省之交界，这一区域物产丰富，人口稠密，交通便利，文化发达，是敌我必争之地。1938年11月，陈毅同志的一支司令部驻在水西村，从此，水西村就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。一年之后，新四军第一、二支队奉命合并，就在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，由陈毅、粟裕分任正副指挥，实行对江南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，执行了党中央确定的“向南巩固，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”战略方针，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，部队从初入江南时的4000人扩大到1.5万人，粉碎了日伪顽三面对我夹击，取得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的胜利。如1938年6月的卫岗之战，8月的新丰之战和奔袭南京城郊麒麟门，1939年5月袭击黄土壩、浒墅关，以及夜袭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战斗，都震惊中外，吓破敌胆，真乃奇兵巧战，力挽狂澜，江南的抗战局面从此大大改观。

水西村内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指挥部机关的六处旧址，最大的是“光裕堂”，这是陈毅、粟裕及指挥部机关的住处，有秘书处、作战科、侦察科、通讯科、机要科、军需处、副官处、军医处、军法处等单位，因住房拥挤，粟裕同志曾带领大家在天井里搭了草棚。伙房离司令部百余公尺，砌有大锅台。单独住在村内的有政治部、战地服务团、通信班、电台中队等单位，住房均系砖木结构，平房房顶较高，如在屋梁上架木板就成阁楼可以住人。上年纪的人们回忆说：那时村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军号声和歌声不断，常看见陈、粟司令奔走忙碌，总是笑容可掬，向乡亲们热情地打招呼。1940年，正月十五元宵节夜晚，日本鬼子偷袭水西，是陈司令挨家敲门来动员老乡们撤离，群众十分感动。

1940年春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，派了近两个师的兵力向我江南指挥部进逼。我军为顾全大局，撤出水西村。同年7月，根据党中央的决定，陈毅、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，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。江南留下新编的第十六旅坚持斗争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水西村这段历史，是新四军军史的重要篇章，钟期光5年前曾著文论述，指出：“江南指挥部的成立，是华中敌后人民抗日力量的集中与凝聚，是向江北发展、将江南与苏北连成一片，化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堡垒，是插向日寇心脏、夺取华东抗日战争胜利的一把尖刀，是执行党中央、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丰硕成果，也为后来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一支骨干力量。总之，江南指挥部的成立，闪烁着中华民族意志与智慧的光辉，显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。”

1984年，为了纪念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45周年，政府决定修复指挥部旧址。

在收集历史资料过程中，我也调查了当时指挥部通信工作的情况。司令部设通讯科，科长贺敏学，司令部单独有个电台中队，共3部电台，中队领导是李景瑞和廖昌林同志。所用机器都是国民党军政部制发的15瓦收发报机，用手摇马达发电。现已知当时在指挥部电台工作过的老同志有：廖辉、谢吉奎、向瑞桃、郭日忠、张翼、徐翔、颜飞、韩迅、汪志祥、肖日光、黄瑞兴、邹日先、程希道、许圣和、李炳祥、王启智等。开始时，电台联络的上级单位只有新四军军部一家，后因形势发展，1940年春，陈毅同志提议与党中央直接通电，得到中央批准，从此后，就增加了对延安党中央以及对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联络。

住在水西村，置身于革命老区，极易触景生情，浮想联翩。

1942年，我是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的小团员，每当遇到粟裕师长，他就叫我“小鬼！”，有时还问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那年年底，恰逢精兵简政要我回家，我想不通，认为粟师长一定肯帮忙，便去向他哭诉，谁知他听完后就哈哈大笑，把我拉到身边耐心开导，我终于被他说服，他留我吃饭，临别时叮嘱我还要好好学文化，我依依地向他告别。1943年清明节后，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军长，那是陪同大哥唐向青从上海抵达淮南（当时新四军军部设在黄花荡），去向陈军长汇报敌区情况。1947年从鲁南突围到鲁西时见到过他，解放上海后见到过他。最后一次是1960年在南京听他的形势报告，他知识广博，快人快语，听他的报告简直是一种

享受……

1984年4月25日，粟裕部分骨灰由楚青偕次子粟寒生、外孙陈正国（也是陈毅的孙子）护送到水西村，我和常州市及溧阳县领导同志一起，陪同她们选定墓地，举行了简朴庄严的安葬仪式，将军自此长眠在水西村。1984年11月1日，“光裕堂”修缮一新，全国各地50多位老同志来到水西村，隆重举行了纪念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45周年和陈毅、粟裕两同志全身塑像的揭幕仪式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同志在会上讲话，并将陈毅同志的长子陈昊苏、粟裕同志的长子粟戎生、傅秋涛同志的长子傅宁介绍给大家，三人正好同是42岁，风华正茂，我想起了陈毅元帅的一首诗：

当年老战士，今有几人存？
新生千百万，浩荡慰忠魂。